

# 新华社胶东分社新闻宣传事业的开拓者

□殷成明

新华社胶东分社诞生于1941年8月13日,是中共胶东区委根据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新华社山东分社指示成立的。当时名为“新华社胶东大众社”,1944年2月29日改为“新华社胶东支社”,1946年3月10日再改为“新华社胶东分社”。胶东分社是新华社在全国各地最早成立的分支机构之一。1950年5月1日,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发出《关于取消区委与行政公署一级机关及调整各地委、专署区的决定》,中共胶东区委、胶东区行政公署撤销,新华社胶东分社也随之撤销。

在从成立到撤销的将近九年时间里,新华社胶东分社创造了我党胶东地区新闻宣传工作的一段辉煌历史,也成为新华社历史上一个耀眼的亮点。九年里,这支年轻的队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用手中的笔和枪与敌人展开顽强斗争,用铁硬的肩膀扛起党交给的新闻宣传工作任务。他们在战火中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在艰难中经历了苦与乐的锻炼,在奋斗中成就了一番伟大的事业。数百名胶东分社人共同创造了胶东分社事业的成功,其中王人三、李达、李维光等同志是胶东分社新闻宣传事业开拓者的代表。



## 第一任社长王人三

王人三(1915年—1998年),牟平县岈岭村人。中师毕业,193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至1939年,任蓬莱县抗日民主政府视导主任。1939年至1941年,任中共北海地委宣传部部长、统战部部长、政府工作部部长。

1941年8月,26岁的王人三出任新华社胶东大众社社长、大众报社社长。当时胶东大众社与大众报社合署办公,一体化管理。他是新华社胶东大众社第一任社长,也是大众报社继贺致平、阮志刚同志之后的第三任社长。1944年2月,胶东大众社改为胶东支社后,王人三同志继续兼任胶东支社社长,直至1946年2月。1946年3月,胶东支社改为胶东分社,胶东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官维桢同志兼任胶东分社社长。这时,王人三同志只担任大众报社社长。

王人三同志到任时,正值《大众报》创刊三周年之际。大众报社经过三年的艰苦奋斗,此时已经走上正轨。王人三是个开创精神很强的人。接过社长的重担后,他决心在胶东区委党委领导下,与同志们一起在党的宣传工作中干出一番事业。

搞好新闻宣传,是新华社胶东大众社社长、大众报社社长的首要任务。王人三上任后,坚定地坚持“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方针,积极争取胶东区委党委的支持,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在报道领域和报道形式上积极探索,胶东大众社和大众报社的宣传报道工作很快出现了生动活泼的大好局面。特别是胶东大众社,在因日伪频繁“扫荡”而在乡间到处转移和电台设备



葛次元(左)与报务员刘思仁、胶东分社电台第二任台长

李达(1905年—1942年),原名于希增,曾用名于伯显,招远人。他出身于殷实的农民家庭,8岁入私塾,后考入天津北洋大学机械工程系,1930年肄业。1931年返籍,任教于招远县从家高等小学。翌年始,在招远县中学任教两年。

1934年,他应天津北洋大学同系同学、长山县(旧县名,位于今邹平市区东部、淄博市市区西北部)中学校长马耀南邀请,担任该校教务主任。二人志同道合,心心相印,均愿为“教育救国”贡献一切。就在这时,国民党反动当局对日寇的疯狂侵略奉行不抵抗政策,致使“九·一八”国耻未雪,华北危机又迫在眉睫。李达积极协助校长组织开展抗日讲演会募捐劳军,发动学生到街头、市集、田间进行抗日宣传。不久,他被介绍加入了民先组织。1937年秋,战事日趋紧迫,李达先安排妻子、孩子回原籍,自己只身留校与进步师生一起开展抗日活动。同年冬,学校遭日军飞机轰炸后,他与马耀南发起成立了长山县保安大队。同年12月27日,姚仲明在长山县太平庄汇集抗日武装力量宣布武装起义,部队番号“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马耀南、李达所组织的保安大队也加入了起义部队。部队后来几经编组,一直战斗在鲁北一带。1938年4月,李达随马保三、韩明哲的第七、第八支队东进胶东,后转到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政治部



胶东分社第一任总编辑李维光。

李维光(1919年—1986年),莱阳县小徐格庄人,出身于农民家庭。1937年4月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开始后,历任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连指导员、中共胶东特委军事部宣传股股长、中共胶东区委秘书、中共北海地委秘书长,中共南海地委宣传部部长、中共胶东区委党校教育科科长、大众报社副总编辑。1946年3月,新华社胶东支社改为胶东分社,27岁的李维光出任胶东分社第一任总编辑。

李维光同志上任后,在胶东分社的队伍建设、业务建设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推动了胶东分社的快速发展。首先是在队伍建设方面,为了整合采编力量,胶东分社成立了采通部,下设采访科、通联科;为了进一步加强对解放区基层情况和前线战事的报道,胶东分社先后在东海、西海、北海、南海、滨北地区和烟台、威海卫建立起七个支社。其次是在业务建设方面,李维光同志主持建立起胶东分社的新闻业务培训制度,并鼓励大家互帮互学、自学成才。他特别重视新闻职业道德建设,要求大家深入一

线采访,坚持新闻的真实性原则,杜绝虚假报道。

李维光同志要求记者坚守良好的采访作风,自己也身体力行。1946年底,胶东分社收到西海支社发来的某记者采写的通讯《一坛血》,说的是昌南县(今昌乐南部)一个敌我拉锯的游击村遭国民党反动武装“还乡团”袭击,许多群众被杀害,血流成河。“还乡团”被打退以后,老村长把被害者的鲜血收集起来盛了一坛子,带领全村人祭奠死难者。这篇通讯写得十分感人,但也存在一些疑点。为慎重起见,李维光决定带领几个同志到实地考察后再发表这篇稿子。他与编辑科副科长王历波、编辑王治本一同前往,通讯员范汇杰和马夫纪得贤随行。他们从驻地莱阳城北泊衣村出发,步行三天赶到西海支社驻地昌邑县马家围子村,向那位记者了解情况。听完介绍后,李维光提出到发生《一坛血》故事的那个村去实地看一看。这时,那位记者有些尴尬,忙说没有这个村,自己是根据还乡团的罪行材料虚构出来的。这件事引起李维光的高度重视,他当即决定撤掉这篇通讯,并当场召集西海支社全体同志开会,对那位记者的做法提出严肃批评。他严厉指出:“新闻消息、通讯是眼前发生的真人实事的报道,不是文学创作,不能虚构编造!”他要求大家吸取教训,坚定不移地坚持新闻真实性原则。

在西海支社处理完事情后,李维光听说胶东军区副司令员王彬正带领部队在潍县寒亭攻打国民党队外圍据点,便决定到战斗最前线进行战地采访。战斗总指挥部设在寒亭北面的一个山岭上,李维光上去请示王彬,要求到前线阵地采访。王彬不同意,说:“最前线有危险,派几名年轻记者去就可以了。”李维光说:“机会难得,还是由我带领他们到最前线吧。”王彬只好答应他的请求。他立即带领随行的几个记者赶到最前线的连指挥所,开始了战地采访。当时,敌人的炮弹不时在指挥所附近爆炸,炮弹碎片和子弹在空中乱飞,随时都有伤亡的可能。李



## 电台第一任台长李达

领导下的联合出版社。同年,李达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8月13日,大众报社成立,李达被调来担任电台台长。当时报社没有收报机,李达和副台长葛次元发挥自身才智,自己动手,安装收报机成功。年底,由于日寇入侵,战事紧迫,大众报社随胶东区委转移于掖县、黄县、莱阳、招远和栖霞西北部艾山山区一带。这种艰苦的战争征途,行则身背重负,停则安机收报,对一位眼睛高度近视的知识分子来说确有很大困难。当时,胶东区孤立于敌后,僻处海隅,地理上又受伪顽反动武装分割,消息闭塞,大众报社对国际国内新闻的唯一来源是国民党中央台播发的记录新闻。为启发群众认清形势,电台收录后再从这些反面文章中找出自己含义来,用此种手段报道国内外形势以正视听。这台自己安装收报机发挥了很大作用,这与李达的辛勤劳苦、积极钻研、克服技术难关是分不开的。

1939年9月,李达带领副台长葛次元(王言恺)等同志,带着耳机细心地从飞过天空的无数电波中找到了新华社的讯号,谛听到延安的声音,并开始接收新华社电讯稿。全报社为之振奋,胶东区委党委还特别为他们记功,予以鼓励和表扬。

1940年2月20日,延安《解放》杂志发表毛泽东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新华社随即向国内外播发这篇重要讲话。李达和葛次元等电台的同志正在接收新华社电文时,国民党军赵保原部向大众报社所驻村庄发起进犯。根据侦察情报计算得知,我电台收报结束时间正是敌人接近到该报社驻地时间。报社各部门按原定计划提前撤离了。电台此时如果撤离,则无法完整抄收《新民主主义论》电文。在这种情况下,李达、葛次元和电台的同志们都坚定地表示,一定要将毛主席的重要讲话一字不漏地抄收下来,然后再撤离。就这样,他们抱着刚刚抄收下来的《新民主主义论》电文爬上北山时,敌人的机枪已经向他们开火了。次日,《大众报》在第一版全文刊发了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

1940年7月初,大众报社同敌人周旋到招远县坡石山时,李达和电台的同志们身背机器冒雨前进。他因近视眼镜被蒙蒙细雨打得视物不清,不慎身陷沟中,磕得头



## 第一任总编辑李维光

线采访,坚持新闻的真实性原则,杜绝虚假报道。

李维光同志要求记者坚守良好的采访作风,自己也身体力行。1946年底,胶东分社收到西海支社发来的某记者采写的通讯《一坛血》,说的是昌南县(今昌乐南部)一个敌我拉锯的游击村遭国民党反动武装“还乡团”袭击,许多群众被杀害,血流成河。“还乡团”被打退以后,老村长把被害者的鲜血收集起来盛了一坛子,带领全村人祭奠死难者。这篇通讯写得十分感人,但也存在一些疑点。为慎重起见,李维光决定带领几个同志到实地考察后再发表这篇稿子。他与编辑科副科长王历波、编辑王治本一同前往,通讯员范汇杰和马夫纪得贤随行。他们从驻地莱阳城北泊衣村出发,步行三天赶到西海支社驻地昌邑县马家围子村,向那位记者了解情况。听完介绍后,李维光提出到发生《一坛血》故事的那个村去实地看一看。这时,那位记者有些尴尬,忙说没有这个村,自己是根据还乡团的罪行材料虚构出来的。这件事引起李维光的高度重视,他当即决定撤掉这篇通讯,并当场召集西海支社全体同志开会,对那位记者的做法提出严肃批评。他严厉指出:“新闻消息、通讯是眼前发生的真人实事的报道,不是文学创作,不能虚构编造!”他要求大家吸取教训,坚定不移地坚持新闻真实性原则。

在西海支社处理完事情后,李维光听说胶东军区副司令员王彬正带领部队在潍县寒亭攻打国民党队外圍据点,便决定到战斗最前线进行战地采访。战斗总指挥部设在寒亭北面的一个山岭上,李维光上去请示王彬,要求到前线阵地采访。王彬不同意,说:“最前线有危险,派几名年轻记者去就可以了。”李维光说:“机会难得,还是由我带领他们到最前线吧。”王彬只好答应他的请求。他立即带领随行的几个记者赶到最前线的连指挥所,开始了战地采访。当时,敌人的炮弹不时在指挥所附近爆炸,炮弹碎片和子弹在空中乱飞,随时都有伤亡的可能。李



胶东大众社第一任社长王人三。

人三同志上任后,胶东大众社、胶东支社和大众报社的宣传

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1948年4月,王人三同志调任中共昌潍地委宣传部部长。1951年,调任中共山东分局宣传部办公室主任。1952年后,历任中共徐州市委宣传部部长、中共徐州市委副书记兼市长、中共徐州市委第一书记。1956年后,历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新华日报社总编辑、中共苏州地委书记兼苏州市委书记。1964年后,任外交部西亚北非司副司长、外交人员服务局副局长,后任中国驻阿联酋塞得港总领事和中国驻乍得、利比里亚、博茨瓦纳等国大使。

## 文化風景

神话,是人类群体的梦,可以让精神紧张、心灵困顿的现代人重新体验灵性的召唤和奇思妙想的乐趣。这些年新神话主义创作潮流方兴未艾,国外的如《纳尼亚传奇》《阿凡达》,国内的如《哪吒》《大鱼海棠》以及带有仙道文化底色的《长安三万里》,其思想背景其实都可以概括为“文化寻根运动”。

谈到神话中的文化寻根,自然要说到蓬莱。在一篇篇游山、山水的文人诗赋中,在一首首词曲颂赞里,文人吟唱着自己心灵深处潜藏的集体梦境:对仙境乐园的追寻,对长生不死的企望。这个相对于现实世界的他界乐园,除了陶渊明的桃花源和道教的福地洞天外,从两汉以来,不论是方士、道士还是文学家反复追寻建构的乐园空间,就是海中蓬莱。

海中蓬莱是与地上昆仑山相对的神仙岛,是古代神话舆图上的神圣空间。

那么,对我们来说,蓬莱是什么?从苏轼的诗文中我读到了蓬莱的三重意境。

### 幸福空间的意象符号—— 仙山蓬莱

在没来蓬莱之前,苏轼就写了很多谈及蓬莱的诗文,比如“相将呼虞舜,遂欲归蓬莱。嗟我二三子,狂饮亦荒哉”,比如“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方丈有无间。旧闻草木皆仙药,欲弃妻孥守市闾”。在得知要到蓬莱后,赴任登州的途中经过镇江金山寺时,苏轼写了一首题为《金山妙高台》的诗,其中一句说的是“蓬莱不可到,弱水三万里”。从苏轼的诗联,很容易会想到唐代诗人李白的“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两位大咖笔下的蓬莱、方丈、瀛洲,是传说中的海上三神山,它们有着共同的特点:于海上,缥缈难求。不同的是,方丈、瀛洲无可寻觅,而蓬莱,因了汉武帝的筑城,有了具象的依托。对没到三神山的两位大诗人来说,蓬莱有着共同的意义:是仙人住所,是修真成仙的成功彼岸,是幸福空间的代名词。这也是蓬莱一词的普世意义。

### 俗世生活的繁忙景象—— 人间蓬莱

不论是作为官员还是游人,苏东坡都毫不吝惜地给蓬莱留下了流传千古的文墨,清人张弓的赞美诗“赖有公来吾五日,三山万古重蓬莱”,并非溢美之词。

作为官员,苏东坡向朝廷提交的奏章里对蓬莱的描述,从初入蓬莱时《登州谢上表》中写的“人淳事简,地瘠民贫”“虽在田野,亦有识知”,到初步了解后在《登州谢两府启》中写的“俗习齐鲁之厚,迹皆秦汉之陈”,都体现了他了解俗世蓬莱、逐渐被这人间的蓬莱打动的过程。

作为游人,苏轼还曾在《蓬莱阁记所见》中写下“登州蓬莱阁上,望海如镜面,与天相际”的句子。登蓬莱阁观海,是东坡先生的雅兴,也是宋代以后历代文人墨客到蓬莱的必选项。观海之后,在《北海十二石记》中,苏轼由衷感叹“真神仙所宅也”。品尝了蓬莱的鲍鱼后,他又为这一蓬莱美食写了长长的诗篇《鰲鱼行》,既表达了他对这特产的喜爱,又写出了鲍鱼的生长环境显示其珍贵:“君不闻蓬莱阁下鰲棋岛,八月边风备胡獠。船舶跋浪電震電,长镜铲处崖谷倒。”看到蓬莱的石头,苏轼说“蓬莱海上峰,玉立色不改”“我持此石归,袖中有东海”。不论是看的,还是吃的,以及勤劳的蓬莱人于波诡谲云的海中采食鲍鱼的景象,都是苏轼笔下可爱的人间,可兹怀念的蓬莱。

就在这可爱的蓬莱,苏轼看到了秦皇汉武遍寻不见的海市蜃楼。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苏轼说:“登州下临涨海,枕簟之下,天水相连,蓬莱三山,仿佛可见。春夏间常见海市,状如烟云,为楼观人物之象。数日前偶见之,有一诗呈为笑也。”这首诗,就是流传千古的《登州海市》:“东方云海空复空,群仙出没空明中。荡摇浮世生万象,岂有贝阙藏珠宫。”这是苏轼见到的海市蜃楼,这是苏轼见到的“蓬莱”,这是仙山仙人之所在,这是苏东坡于人间蓬莱亲眼所见而身不可至的仙山蓬莱。

### 凡人可成仙的一个念想—— 仙境蓬莱

蓬莱,是通往仙境的入口,是距离仙山最近的人间。

“蓬莱方丈应不远,肯为苏子浮江来”是苏轼在他人生被贬谪的最后一站海南岛写下的诗。面向南海而立,饱经宦海浮沉的一代文豪苏东坡,忘不了在难以出现海市的季节,蓬莱为他呈现的海市蜃楼。那一天,“重楼翠阜出霜晓,异事惊倒百岁翁”,让他不由感慨“人间所得容力取,世外无物谁为雄”。从汉武帝时代李少君所言“合则见人,不合则隐”来看,苏轼已经“合则见人”了。在如梦似幻的海市蜃楼面前,苏轼一定有了个人境界的升华。

此后,第一次遭贬谪的苏轼,在第一次被起擢的地方登州,写下了在官场沉寂五年多后再度从政的第一手笔《乞置莱菔盐铁》《登州论议水军状》,为民请命,为国效力。

离开蓬莱以后,苏轼怀念的,不再是未到蓬莱前那虚无缥缈的三神山,而是融合了仙山与人间的仙境蓬莱。这里有神仙的洒脱,有超脱于世外、贱形贵神的精神内核,有“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的超然,体现在苏轼身上,就是此后的人生中,无论何种境遇,都能不计较自身处境的旷达心态,无论何种身份,都实干笃行、造福百姓的行为处事。

每一个个体在人生世间必然经历种种磨难,在这个过程中超越自己,打破束缚自己的“结果”,得悟个人之“道”,以个人之所能,去完成一个事业,造福一个人间。

或许,这正是海上蓬莱的文化之根。



投稿邮箱:ytrbzk@126.com